

人本论衡

陈克良◎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人 本 论 衡

陈克良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本论衡/陈克良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610-5770-4

I. 人… II. 陈… III. 人本主义—研究 IV. B0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5214 号

责任编辑: 董晋骞
责任校对: 合 力

封面设计: 王奕文

辽 宁 大 学 出 版 社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网址: <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抚顺光辉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印张: 6.75

字数: 181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10-5770-4

定价: 20.0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人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高尚的主题；又是一个理论上众说纷纭、践行中目标各异的主题。国内外对人本主义的研究源远流长，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不胜枚举。长期的研习使我深感人本思想的文化底蕴厚重无比，难以轻取和穷尽。《人本论衡》只能撷取人本思想发展长河中有代表性的若干典型思想，进行研习度衡。以期得到管中窥豹的效果。

《人本论衡》坚持逻辑、认识和历史发展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结合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出发点。在该平台上，展开对人本思想的探究度衡，尤其是对人本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阶段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观念进行深层探究度衡。并试图通过对古今中外人本主义思想的变迁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性节点，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人本思想、近代西方社会的人本主义思潮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本思想的探究研习基础上，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在人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考究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以期从中取得本质性、规律性的认识，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人本论衡》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人本”就是民主。人类社会只有建立起高度的民主政治，才能有效地制约腐败，打破“历史周期率”，使社会长治久安；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使社会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公正、公平，实现社会和谐；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民主政治是人本思想的真正核心。而民主需要法制来保障，所以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根本之举。

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博大精深，思想倾向稳固恒定；与中国重

集体轻个体的传统价值观相联系，其思想主旨和核心是“重民、贵民、亲民、爱民”、“以人为本”。古代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他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尚书·泰誓》篇说：“惟人为万物之灵”。《周易》认为，人处于宇宙的中心，是宇宙的观察者和体悟者。孔子把人置于宇宙中心和社会主体的地位，并用中国特有的表达方式提出了人本主义观念，创立了“仁”学。《礼记·礼运》篇说：“人者，天地之心也”。儒家的人本主义哲学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就是价值的尺度，人是宇宙万物中最有灵性的。儒家的人本主义哲学贯彻到对国家的治理中，就是著名的“民为邦本”的人本主义治国理念。几千年来，“民为邦本”的人本主义理念一直主导和影响着中国社会。这种民本思想包含有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揭示了深刻的执政规律，并发挥了客观的历史作用，但它也存在局限性。因为对民本思想中的“本”字从来就有种种不同的诠释。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从来都没有把民作为国家的根本；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真的有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在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意识里，“民为邦本”充其量不过是统治策略的一种体现。他们至多把民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和资本（本钱），甚至公开把统治国家称之为“牧民”。他们的重民、亲民、爱民，就如主人爱自己的牛马猪狗，绝不不可能平等地看待“子民”更不可能把他们看作是主人。

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传播都离不开经济状况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民族心理。中国古代的经济是农业型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也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演化为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使人们注重血缘，膜拜祖先，推崇传统。几千年来形成了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缺乏民主，抹杀个性，推崇权位，容忍独裁。这些都给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人文精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民

本观念。这种中国式的民本观念，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是注重个体的人格；人们习惯于从自我与他人及社会群体的关系中去体验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角色，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得出人是具有集群性、互动性、依附性的注重伦理道德的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而且，作为伦理之邦，人们把伦理原则放在第一位，“善”与“不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准绳。这种伦理本位的文化十分普遍，无论是儒家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把“内圣外王”作为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并断定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的功夫。这种内倾性，排斥了独立个体的地位，膨胀了群体的地位，君王的地位。人们推崇追求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鼓吹“崇善”的极境，一方面是内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为（视、听、言、动）必须合于“礼”，即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成了修身、内省的标准。人们既然以伦理道德为纲常，自然界、功利等就理所当然地被排斥在视野之外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人们思维的中心内容，就被限定在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的桎梏之中了。这就形成了农业宗法社会特有的缺乏民主，抹杀个性，推崇权位，容忍独裁的中国式民本观念。对于封建统治来说，这是庞大而又系统的思想体系，它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撑，为封建统治的延续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相对于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这种先天不足民本观念，在弱肉强食的近代社会中，充分暴露出它的弱点，显示出其无力、无助、无能的品性。

总而言之，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和基本内容看，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不可谓不厚实，然而由于受到过分强

大、超级稳定的封建政治的桎梏，使它只能在笼子里跳舞，并在近代中国几乎匿迹销声，让位于西方的人本主义。

与中国重集体轻个体的思想主旨相对应，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个体，并把个体上升到“类”的高度。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普罗太格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是，成熟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是针对“以神为本”提出来的。西方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以来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与价值观。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主要坚持“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根本”的价值准则。其一，推崇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人格；其二，颂扬人的自由，呼唤个性解放，追求现世幸福；其三，称颂人的能力和品德，歌颂人的理性和理智。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先后通过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和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被西方社会广泛接受，并逐渐随着资产阶级发展壮大而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当然，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在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有不同的视角：人文主义侧重个性解放、个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人道主义作为道德领域的人本主义，重视人的生命；人权主义重视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应得的权利和利益，特别是重视保障个人自由和天赋权利。18世纪末期，西方人文思想发展进入实践时期，其标志性事件是1776年《独立宣言》、1789年《人权宣言》和1791年《人权法案》相继问世，它们以法律和政治纲领的形式把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主张固定下来，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丰富了资产阶级人本思想。整个19世纪，资产阶级人本思想全面发展，理论上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健全。20世纪以来，西方人本主义又有了重大的发展，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和罗杰斯。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从而把人本主义从哲学领域、政治领域导入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人本精神在管理领域、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见，西方的人本主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逐步发展、完善的。

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颂扬了人的个性

解放；颠覆了封建神权、促成了民主法治政治，强调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个性、幸福等基本权利。它在使人类摆脱神学束缚、倡导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方面，都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尽管西方的人本主义，主要是从人和动物相区别的类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更多看到的是人的类存在、类本质和类价值，相对多的是强调抽象人的共同性、普遍性而忽视具体人的差异性和个别性，因而在对人的深层次特征理解上显得肤浅与苍白。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 20 世纪提出并建立在心理科学发展基础上的新以人为本主义理论，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并在管理、教育领域得到成功应用，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例。

从西方人本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上分析，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工商经济为主。这种经济类型，特别是它的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力。而且在欧洲没有形成像古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的社会群体。各个城邦国家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从来没有取消自己的国界而合为一体，而是小国林立，整个社会是一个个松散个体的组合。相应地，整个欧洲世界观的核心也就是个体性，“不依附于他人”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也就是说西方民族崇尚以个体为本位，崇尚自由民主。而且，西方的知识界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和探索社会相结合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文献记载和哲人们的著作残篇，都说明自然界和社会都是这些思想家研究的对象。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思维传统却一直在西方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比比皆是。到了近代、现代，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爱因斯坦说过，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自孔子以来，到近现代以至当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学家的寥若晨星。中国古代的人们当然也

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相附会，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们大都是为了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把自然界视为比较独立的研究对象。西方民族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科学和民主使西方社会强大甚至暴发，使他们在近代社会中出尽了风头。

中西方人本思想在近代社会中的不同遭遇，还取决于其主权定位的显著不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主权在天”，而西方人本主义的思想是“主权在民”。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热烈鼓吹“君权神授”，中国在奴隶社会的周王朝时，就称武王是“受命于天”，自称周天子，一切“礼乐（政令）征伐（军令）自天子出”。王权是神授的，神圣不可侵犯。考古学从殷周的金文、甲骨文的大量卜辞中发现，当时统治阶级利用劳动人民对自然力量的迷信和崇拜，把自己的意志假托为上天的命令，称之为“天命”。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也都自命为天子，就连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也要臆造出某一个故事或事件，以便证明自己受命于天，标榜自己是“替天行道”。无独有偶，君主（国王）的权力来源于神的观念，在西方世界也有过流行。古埃及的法老（国王）也自称为“太阳的儿子”，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王自称为“月神的后裔”。罗马的奴隶主为了镇压奴隶起义，篡改了原始基督教的革命内容，重新解释教义，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最先用“理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并进而论证“君权神授”，为罗马帝国的对内专制和对外侵略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直到17世纪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还宣称他的权力来自上帝，以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维护其专制制度。然而关于“君权神授”思想的普遍性、深入程度、持续时间和影响力，西方世界远不如中国古代。“主权在天”的思想虽然不是中国的专利，但在中国古代确实是一道无人能及的主食。而且，一个更致命之处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始终都是把

“主权”当作一种“私家”之权，而不是一种公共的权力。中国帝王专权意识极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帝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尽管在周初思想家们的心目中，君权事实上是来自民意支持，因为君王必须以民心为鉴，只有君王秉德而行，深得民心，方能“得天下”。然而，绕了几个弯，最后又转到了“君权神授”、“主权在天”的范畴，重新回到了湮灭民主的独裁政治。而随着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前进，非民主的中国民本思想当然会失去其活力。

在古雅典的民主制实践中，城邦的“主权”便是一种公共的权力，一种代表所有公民利益而独立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当时初创议事会形式时，就已经孕育了将权力视为一种公共权力的观念。正是由于古雅典人有这种“公共权力”的观念，所以才能够发明出以普选的方式来选举执政官的这种制度形式，这应当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使这种文明规范化和制度化了。政治权力的公共化是古希腊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地域的特有现象，她是由那个特定族群的特有生活方式决定的，她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特例。因为除古希腊以外的古代文明，少有例外地均把政治权力作为一种世袭的私家之权力。然而这个特有现象，经过文艺复兴，却演化为西方世界的普遍形式。而政治权力公共化观念在逻辑上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主权在民”，即获取政治权力合法渠道是直接获得民意认可，或者说政治权力行使的唯一合法性依据就是民意。而且，古雅典的“主权在民”理念是通过实践的政治制度创制来实现的，他们政治改革的实践探索，以制度创新的实践方式充分阐释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古雅典城邦民主制所体现出来的，不是口头上对民意的尊重，而是实际行动上对民意的服从。因为谈尊重民意者，是以主权拥有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地来看待民意，在他说要尊重民意的背后，预设了他有不尊重民意的权力。但服从民意则不同，这时民意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民意为主、为大，而统治者只是

执行民意的工具，只具有服从民意的义务，而没有半点挑战民意的权力。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才能够称得上“民主”。

中西方人本思想的主权定位的不同，导致中西方人本思想的主体定位也不同。

中国帝王强有力的专权政治及其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造就了中国古代人本思想重视群体、重视人际和谐、侧重价值完满、颂扬集体力量、重视集体利益，而且这种所谓的集体，往往就是君王的“家天下”。表面上，中国古代民本论是与君本论相对应的政治主张。实际上这种民本论是从维护君主出发的，它虽然强调民是社会财富的根本来源、王朝兴衰的决定力量。但是，它是在承认君主专制的前提下主张王道、仁政和德治，爱民、重民、恤民实际上是“以君为本”的开明统治策略。而且这种民本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主要是一种观念而非实践，甚至连这种观念有时也不能见容于当朝者。明太祖就因为孟子的民本观而下诏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取消了“配享”的地位。

西方的民主意识必然地引导西方人本主义显示出自己的个性，使其侧重个体、强调个性解放、个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把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伦理，挖掘人性、张扬个性，作为社会的根本真谛。西方人本主义崇尚个人追求、侧重人生目标的实现；重视人际区分、重视保障个人自由和天赋权利。西方人本主义强调重视人的生命，它又包括两个层面：与个体的自我意识相联系，强调尊重个体的生命本身，尊重和爱护他人，这是文艺复兴的主流意识；与类意识相联系，强调作为类的一员的光荣与责任，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并为人的幸福而奋斗。

马克思、恩格斯人本思想正是在民主意识极强的欧洲沃土上拔地而起的。马克思、恩格斯紧密结合当时西方世界现实，批判继承资产阶级人本思想，以及空想社会主义人本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以人为尺度，把人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即由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到人对物的依赖关系，

再发展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阶段。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物欲横流。马克思的人本理论，正是针对这种“以物为本”的现象提出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地分析了资产阶级人本观历史地位，论证了无产阶级人本观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工人贫困的根源，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权利体系，必须消灭私有制。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无产阶级将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89页）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新型政权，才能有效地确认和保障无产阶级的人权。并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夺得民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89页）。社会成员的自由个性将因此得到保证，“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实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1页）“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页）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何等地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把民主政治的建立作为实现真正的人本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此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和实践开始以全新的模式发展。从列宁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以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人本思想在深化，人本实践在深入。

毛泽东的人本思想是既区别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又区别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新型民本思想——人民本位的思想。毛泽东的人本思想在中国现代人本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奠定了当代中国人本思想的理论基础，其中的人民本位观、人民动力观、人民利益观等都为以人为本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导。在他的文章和话语里，“人民”和“群众”出现的频率很高，且热情洋溢、语出千钧。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等等。“人民”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且创举颇多。他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实践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怎样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他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生致力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他一生最担心的就是党脱离群众的问题，一生致力于打破“历史周期率”。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一心为民的领袖，却在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背离了自己定下的宗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可靠制约。

邓小平的人本思想及其实践充分体现了民主思想和法制观念。邓小平人本思想核心内容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位，一切着眼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他始终把人民作为社会活动的价值主体和评判主体。邓小平指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而党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党“不能站在群众之上”。他时时刻刻心系人民，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的一切理论和实践的最高准则。他阐述了人民群众为本位的主体地位，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这种主仆关系不能颠倒。他提出了人民群众为本位的主体目

的，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实践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为本位的主体目的。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人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理论和实践在主体目的的实现中统一起来。邓小平非常关注人民群众的各种权利，而且指出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并强调为了保障人民群众各种权利，必须反对封建主义的特权。为了有效防止搞特权、特殊化，邓小平提出要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督检查。强调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邓小平还特别重视用法律手段平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人人有依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与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最大的不同正是高度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尊重和保障了个体权利从而更充分地调动起了人民的积极性。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稳稳地站在巨人的肩上，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理论，传承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人本思想精华，纠正了毛泽东同志人民本位思想中的偏差，发扬光大了邓小平同志的人本思想，提出了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本理论，并付诸实践，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巨大成果。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以民为重，以民为先，二者是完全一致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把以人为本作为执政兴国的重要理念。

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本质与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凝聚、提炼和升华，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是对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扬弃，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

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的重要演讲中指出：“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思考发展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上，倾注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心血，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论智慧和创新精神，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新飞跃。我们必须准确地把握这一新飞跃形成的背景与历史地位，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并使之转化现实。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就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类、群体、个体利益的和谐统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就是通过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推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努力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加强人文关怀，加强人权保护，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使以人为本这一执政兴国的重要理念制度化、法制化，以确实保证我们的党和政府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永远做人民群众的忠实公仆。

新世纪是一个属于“人本主义”的世纪。现时代不仅中国在大力倡导和践行以人为本，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人。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强调“世界一切事件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人类处于备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可见，深入研究和践行这一理论，对于顺应当今世界文明发展潮流，富国强民，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陈克良

2009年3月29日于杭州一清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篇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1
一、中国远古原始共产主义型的民本观念	1
二、先秦儒家慈善君主型的民本思想	6
三、先秦及以后儒家德治理念型的以民为本观念	13
第二篇 中西方人本思想的本质差异	20
一、西方人本主义及其历史演进	20
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演变及其实质	30
三、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35
四、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的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39
第三篇 民主是以人为本的根基和保证	43
一、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实践中的人本体现	44
二、被理解为反民主的《理想国》中的人本体现	48
三、中国大同理想中的民主、民生思想	52
第四篇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本思想	59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59
二、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	68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特点	84
第五篇 列宁关于建立人民民主和保障民生的理论和实践	89
一、列宁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特征的人本思想和实践	89
二、列宁以保障民生为首要任务的人本思想和实践	97

三、列宁以发展文化事业，提高民众整体素质为 载体的人本实践·····	105
第六篇 中国人本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开创性突变·····	110
一、人民主人观是毛泽东的人民本位思想的理论 前提和核心·····	111
二、人民动力观是毛泽东的人民本位思想的集中 体现·····	117
三、人民利益观是毛泽东的人民本位思想的出发 点和归宿·····	120
四、毛泽东人民本位思想实践中的偏差·····	127
五、毛泽东人民本位思想的“集群本位性”·····	131
六、“大民主”的人本悖论·····	134
第七篇 中国人本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巨大飞跃·····	138
一、邓小平人本思想是中国人本思想发展的巨大 飞跃·····	138
二、邓小平人民群众为本位的主体意识体现了唯 物史观的复归·····	140
三、邓小平“关键在人”的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 义的人文关怀·····	152
第八篇 江泽民“以德治国”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人民性·····	155
一、德治内涵的人民性·····	155
二、“三个代表”的实质和核心在于人民性·····	160
三、“以德治国”与“三个代表”统一于人民性·····	165
第九篇 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	170
一、以人为本这一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	170
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179
三、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	188
后 记·····	197